

袁世凯与官立山东大学堂

1914年停办的山东高等学校，前身是1901年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官立山东大学堂系近代在北京以外官办的首所地方高等学堂，被誉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源性大学。

官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与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在创办新军及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才者，立国之本”，主张地方改良从教育先行入手，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后大力支持“育材兴学”。1901年初慈禧颁布“变法”上谕，责令各省上报改革主张，袁世凯复奏十条，建议“广建学堂”和“崇实学”。1901年11月4日，袁世凯在上书的《山东试办山东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中提出：

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

《折稿》特别禀奏：

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庶几所志者闳，而所成就者亦大，行之既久，非独可与各国学堂媲美，且駸駸乎复古学校之旧矣。

在120多年前能够提出办学是“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彰显了格局和远见。2011年山东大学将这两句话作为办学宗旨。

11月16日，《折稿》获准，光绪皇帝御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这天被作为官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建时间，校址选在济南泺源书院旧址，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官立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被作为示范在各省推行，清廷谕令“将袁世凯的原奏和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



山东大学堂开学教职学员合影

1902年4月，周馥署任山东巡抚不久，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多亩修建校舍和操场，1904年冬季官立山东大学堂迁入，并根据当时学部要求更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学堂总办改称监督，首任监督陈恩焘，山东大学堂原址改建为山东师范学堂（山东师范大学前身）。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重新制定各种学校章程，史称“壬子学制”，据此学制及章程山东高等学堂又更名为山东高等学校，学校监督改称校长，首任校长黄国恩。1913年根据“癸丑学制”，北洋政府采取教育分区体制，据此山东高等学校应于1913年6月裁撤。

从1901年11月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办到1914年7月山东高等学堂停办，共“培养了817名毕业生，选送了131人去欧美和日本留学，不少人后来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民主革命先驱或有重大建树的知名教育家，对传播进步思想，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进步，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中就有周恩来总理的老师高盘之（原名高守铭，号亦吾），1911年高盘之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史地教员时，在这里遇到了12岁的周恩来。周恩来曾回忆，“少年时代我在沈阳读书时，曾遇到山东高盘之先生的教诲与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没有高盘之先生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摘自1月5日《齐鲁晚报》韦钦国文）

宋辽两国的皇帝是如何“见面”的

契丹使臣的特殊使命

嘉祐二年（1057）九月，北宋都城开封迎来了一批契丹使臣，此行他们带着一个特殊的使命而来。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友好已逾半个世纪，交聘往还，年年都有，已属稀松平常，尤其是最近几年，双方来往频繁，亲如一家。两年前，即至和二年（1055）八月，在位二十多年的辽兴宗崩逝，兴宗的长子耶律洪基即位于柩前，是为辽道宗。当月，宋朝边境的雄州就接到这一消息，不等契丹的正式通告，宋廷就立即组建了使团，准备前往致意。

使团此行一方面对契丹新遭的国丧表示哀悼和慰问，另一方面也对辽道宗的即位予以祝贺。次月，契丹告哀使才到开封，通报了兴宗之丧。仁宗甚至亲自穿上丧服为辽兴宗举行了哀礼，宰相带领着群臣也前来慰问如仪，双方感情之融洽，可见一斑。

但这次契丹使臣的来意，却有些令仁宗为难。契丹使臣随行带来了新君辽道宗的画像打算送给宋仁宗，同时也提出想要换得一幅宋仁宗的画像带回契丹。古代不比现代，双方最高领导不可能举行会晤，想要见上一面，自是难如登天。辽兴宗与宋仁宗差不多同时即位，两位皇帝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光，竟始终无法见上一面，不免留下很大的遗憾。

辽兴宗想到了一个两国皇帝会晤的变通方案。

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辽兴宗对臣下表示：“朕与宋朝皇帝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以把朕的这个想法给即将前来庆祝元旦的宋使说说。”不过，宋朝方面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于是，面对宋人如此的不解风情，辽兴宗在临终前，不得不再次派遣使者入宋，先把自己的画像送给了宋仁宗。可惜辽兴宗并没有等到宋朝把仁宗御容送来，就撒手人寰，相识二十多年的两位“老朋友”终究是相交一场，却始终缘慳一面。

宋仁宗的自信

有鉴于此，辽道宗在即位两年后就派出使臣入宋，提出了交换两国皇帝画像的请求，道宗此举大概是为了替自己的父皇弥补遗憾吧！宋仁宗收到这个请求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下旨让群臣商量办法，大臣们担心把皇帝的画像送给契丹会有潜在的风险，如拿到画像后，去作一些“厌胜之术”，诅咒皇帝，那就会危害到皇帝的人身安全。

仁宗经过一番思虑之后，还是同意了契丹使臣的请求，约定下次庆祝元旦的使臣前往契丹时，会把仁宗的画像放在衣箱里带过去。

据说，这次宋朝派遣御史中丞张昇前往契丹赠送仁宗的画像，辽道宗带着盛装的仪仗队，亲自出宫相迎，当见到宋仁宗御容的那一刻，辽道宗被征服了，脸上露出了既震惊又严肃的

表情，当即对着仁宗的画像拜了两拜。

“偷画”宋仁宗

巧的是，嘉祐二年（1057）宋辽互换御容之际，契丹方面可能已经从别的渠道拥有了宋仁宗的画像。《辽史》记载，清宁年间（1055-1064），辽道宗曾派遣契丹最善于“写真”的画家耶律裒履出使宋朝。史称耶律裒履“风神爽秀，工于画”。辽道宗即位后，他奉命出使宋朝，宋仁宗设宴款待了他。他本来是有可能仔细端详仁宗相貌的，可惜席间仁宗的脸一直被御座前的一个花瓶挡着，使他无法看清仁宗的长相，直到宴会完毕，起身告辞之际，他才有机会看了仁宗一眼。

就这一眼，他就默默记住了仁宗相貌，在返程途中边走边画，待到了宋辽边境上，一幅仁宗的“写真”就画好了。这时他把仁宗的画像拿出来给宋方饯行的人看，在场的宋人见到仁宗的画像时简直惊呆了——“骇其神妙”。显然，在这个故事中，不是仁宗的画像征服了契丹使者，相反，是契丹使者以其鬼斧神工般的高超画技征服了宋人。

皇帝的画像，并不是一般的画作，而是附加了神圣价值的艺术瑰宝，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天各一方的两位皇帝的见面会晤，更在这种“见画如面”的过程中竞争天命。（摘自黄博著《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长城的“暗门家族”

历时4年多时间，跨越我国10个省区，天津大学研究团队对明长城全线超九成人工墙体进行分辨率接近厘米级的连续拍摄，甄别出130多处暗门实物遗存并首次构建其“家族图谱”。长城的“秘密通道”得以走出史书记载，呈现在世人面前。

“长城不仅仅是大家观念中的‘一道墙’。”研究团队负责人、长城防御体系研究专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解释说，暗门是一种矮小门洞，是根据地势、军事等需求开设在长城隐蔽段落，朝向关外的“秘密通道”。

这些鲜为人知的“秘道”，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听说过古代侦察兵‘夜不收’吗？”研究团队成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哲说，有一些宽度与高度仅容一人俯身而过的暗门就是供他们通行之用，不仅设置地点十分隐蔽，而且兵士返回后还需验准暗号方能进入。

此次研究还首次发现了“暗门家族”中最为隐秘的突门实物。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类似突门设施的记载，《墨子·备突》篇中对突门进行了专门的著述。此后，唐、宋、明、清学者均对突门有过记述，但现代相关研究论文却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发现对应的实物证据。

突门是暗门中最为秘密的出口，面向敌方的一面用砖砌伪装，面向己方的一侧实为空心。敌人从外部根本无法分辨突门位置，但当临近的主关口受敌袭击或出现其他紧急情况时，士兵可以如鸡蛋破壳一样从内部击破突门，实施奇兵突袭。清晚期著名学者魏源曾用“藏于九地之下为暗，动于九天之上为突”来描写突门提供的军事行动的突然性。

2019年，团队首次拍摄到了疑似突门遗迹，外观像是长城上的一个“破洞”。截至目前，结合古代舆图已确认共计不少于220



天津黄崖关长城的一处暗门

处暗门，并汇总130多处实体，发现了明代官方史料中“夫祖制，边墙下多留暗门”的明确记载，从而以实物和文献双证据明确了关、口之下存在暗门这第三层级通关设施。

暗门这一历史遗存，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长城的开放性。暗门更多的是两侧交流的通道，证明长城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在有序地“开放”。如明代官方记载，政府允许游牧部落通过暗门往返于青海和河套地区放牧，一些较大的可容两匹马双向对过的暗门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部分暗门还用于通商往来。

（摘自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白佳丽文）

“紫禁城骑马”是真骑马吗

紫禁城一称，源于明代。明代的皇宫，既喻为紫宫，又是禁地，故旧称“紫禁城”。明代基本上没有在禁宫中骑马或乘轿的情况出现。大臣们从左右长安门入宫，步行至午门。

到清代，“紫禁城骑马”或乘轿，也称为“赏朝马”，成为对宗室王公及文武重臣一种崇高的礼遇。当然，清初准许骑马进入紫禁城，也只能进入外城部分，到景运门外下马，其他大臣只能循明朝旧制，徒步入朝。下马碑至今尚存，显示出宫廷威严。

正式明文允许大臣们骑马入宫，始于乾隆时期，主要是考虑到王公大臣星夜入朝，遇雨雪天气，行走不便。此外，内外文武大员立有重大功劳，或受特

别恩宠，也会受赐“紫禁城骑马”，是为殊荣。到嘉庆时更特许年过七十的大臣，可以在禁城中乘坐一种叫“肩舆”的小轿，即一把椅子两边绑上抬杆，由人抬着入宫。

在实际执行中，得到“紫禁城骑马”特权的大臣，并不都骑马，多用“肩舆”。这样一种变通，实际上在乾隆时期就有了。这是因为：一来考虑到马匹万一控制不好，可能冲撞了宫中仪仗；二是受赐“紫禁城骑马”的大臣，不少人年龄偏大，有的人骑马困难或根本就骑不了马。晚清时期，清廷礼制多被打破，而赐“紫禁城骑马”之制，也变得较为普通，并非“殊荣”了。（摘自《文史博览》2022年第12期 齐世明文）